

讀《論語》

—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李贄在這節下留下了八個字：「孔子年譜，後人心訣。」但原話過簡，有點像啞謎，古今猜者，蔚為壯觀，所言或淺或深，迄難得其要領。唯梁漱溟截斷眾流，痛下殺手：

要認明孔子畢生所致力的是什麼學問，當從這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以下尋求去。然而所云「三十而立」，立個什麼？卻不曉得其實際之所指。向下循求，「四十而不惑」，雖在字面上「不惑」總是不迷誤之意，卻仍不曉其具體內容。「五十而知天命」的「天命」果何謂乎？當然是說在其學問上更進一境，顧此進境究是如何，更令人猜不透。「六十而耳順」，何謂耳順？頗難索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字面上較「耳順」似乎易曉，但其境界更高，實際如何乃更非吾人所及知。試想：在孔子本人當其少壯時，固亦不能預知自己六十、七十的造詣實況，外人又何由知之？乃後儒竟然對於如上一層一層進境隨意加以測度，強為生解，實屬荒唐。

當然，不能確知其所指，不等於不能領會其大意。如果細細悟入，也可能成為足供後人參照的「心訣」。即以「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句而論，賈寶玉作文稱「夫不志於學，人之常也；聖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難乎」，被賈政痛斥為「不成話」，但「志學」又豈易言哉！現代傑出的作家與學者廢名記述：

前幾年我對於孔夫子所作他自己六十歲七十歲的報告，即「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不能懂得，似乎也不想去求懂得，嘗自己同自己說笑話，我們沒有到六十七十，應該是不能懂得的。那時我大約是「三十」，那麼四五十豈非居之不疑嗎？當真懂得了嗎？這些都是過去了的話，現在也不必去挑剔了。大約是在一二年前，我覺得我能了解孔子「耳順」與「從心」的意思，自己很是喜悅，誰知此一喜悅乃終身之憂，我覺得我學不了孔夫子了，頗有兒女子他生未卜此生休的感慨。去年夏間我曾將這點意思同吾鄉熊十力先生談，當時我大約是有所觸發，自己對於自己不滿意。熊先生聽了我的話，沉吟半晌，慢慢說他的意思，大意是說，我們的毛病還不在六十七十，我們乃是十五而志於學沒有懂得，我們所志何學？我們又何曾志學？我們從小都是失學之人。

熊氏一代大哲，其自省也如此。我們呢？我們是夠格的學生嗎？我們是夠格的學者嗎？「我們所志何學？我們又何曾志學？」——茫茫人海，芸芸眾生，有幾個能經得住這一聲喝問？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人是有文化——也就是能「聞道」的動物，沒有文化——也就是不曾「聞道」，就與其他動物沒有差別，人生獨有的意義與價值都無從體現，生也就等同於死了。所以宋人黃晞稱：「生而不知學，與不生同。」所以明人錢宰稱：「盛衰固常理，何必金石堅？朝聞庶有得，夕死不愧天。」所以清代人魏源稱：「不聞道而死，曷異蜉蝣之朝生暮死乎？」《漢書》記載，漢宣帝即位之初詔議立武帝廟樂，名儒夏侯勝以武帝「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表示反對，被指控為非議詔書、毀污先帝而下獄；跟他一起被捕的還有未舉劾其罪的丞相長史黃霸。身在牢房：

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可死矣。」勝賢其言，遂授之。

與之前後輝映的是焦竑《玉堂叢語》中的記載：

石首楊文定下錦衣獄，與死為鄰。公勵志讀書不止。同難者笑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曰：「朝聞道，夕死可也。」

孔子並不諱言「死」與「短命」之類的字眼，遣詞的直白正體現了態度的通達，這一點深受錢鍾書的推崇：

釋老之言雖達，胸中仍有生死之見存，故有需於自譬自慰。莊生所謂「懸解」，佛法所謂「解脫」，皆尚多此一舉。非

胸中橫梗生死之見，何必作達。非意中繫念生死之苦，何必解脫。破生死之執矣，然並未破而亦破也；忘生死之別矣，然未即忘而亦忘也。宋儒所謂放心而未心放者是也。《論語·里仁》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明知死即是死，不文飾自欺，不矜誕自壯，亦不狡黠自避，此真置死於度外者。

藝術批評家王朝聞晚年或與會，或登壇，介紹者幾乎沒有例外地稱其為「王朝（cháo）聞先生」。王氏一忍再忍，終於忍無可忍，專門聲明：「我叫王朝（zhāo）聞，不叫王朝（cháo）聞。」自述本名乃王昭文，以早年投考杭州國立美術專科學校時與同班同學同名，遂取《論語》名句中的前二字為名，既不改讀音，又借此寓意。今人莫明其義，誤讀其音，不但聽來逆耳，而且也湮沒了其命名的用心，主人的鬱悶也就不難想見了。正是：

名不正則言不順
是可忍孰不可忍

三

子曰：「君子不器。」

徐英《論語會箋》融會古注說：

器者拘於一用，譬如耳、目、口、鼻不能相通。故君子之學，不可拘泥於一器，必求其才之通、識之達，然後可以用周於天下矣。

隨着科技日益發達，分工日益細密，掌握專門技術也就是把自己鍛造成為某一種「器」既成為我們謀生的手段，也成為我們追求的目標。正如米蘭·昆德拉揭示的：「科學的興起把人推入了一條專門化訓練的隧道，人越在知識方面有所進展，就越看不清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看不清他自己」，最終陷入海德格所謂「對存在的遺忘」——也就是由「人」異化為「器」。然而「君子」雖不一定「不器」，但僅僅成「器」則一定不是孔子心目中的「君子」。錢穆說：

一切知識與學問之背後，必須有一活的人存在。否則知識僅如登記上賬簿，學問只求訓練成機械，毀人以為學，則人道悖而世道之憂無窮矣。

蓋成「器」所需要的只是訓練（training），成「人」所需要的才是教育（education）。英國藝術史家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在《文明》一書中他力辯教育不同於訓練：訓練是為了獲取謀生的技能，而教育則是為了幫助人們理解生活，從而享受生活中更為高尚的樂趣。真正受過教育的人崇尚理性，熱愛真理，有豐富的感受能力，有一定的價值標準。在貝爾看來，「只有為得到美而有意識地犧牲舒適的人」才有價值觀念，選擇如何生活的教育而不是如何獲利的訓練——也就是選擇如何成「人」而不是如何成「器」，才是高度文明意識的表現。接受了這種文明洗禮的人能「以個人的聰明才智和感受能力認真反對群氓本能，這樣的文明決不接受像廉價處理品那樣的低標準」。

「不器」的君子，正是「決不接受像廉價處理品那樣的低標準」的精神貴族。

四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清儒陸世儀《思辨錄》闡發說：「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思處皆緣於學，不學則無可思。」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闡發說：

學與思兩者缺一不可。有學無思，只可記得許多沒有頭緒條理的物事，算不得知識。有思無學，便沒有思的材料，只可胡思亂想，也算不得知識。但兩者之中，學是思的預備，故更為重要。有學無思，雖然不好，但比有思無學害還少些。

「學是思的預備，故更為重要」，這也是孔子的經驗——除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句抽象的理論概括，孔子還另作過形象的現身說法：「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然而思可蹈空玄想，學需實在功夫，於是「方今之世，多思者而少學者，唯其思者多不學也，是以其思或無知而狂悖，或孤陋而陳腐」（蔣寅《金陵生小言》語）。一位智者給我們講過一個故事：

有那麼一個窮鄉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來了。他湊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撐了布，遮住頭頂，居然到家沒有淋得像落湯雞。他自我欣賞之餘，又覺得對人類作出了貢獻，應該公之於世。他風聞城裏有一個「發明品專利局」，就興沖沖拿棍帶布，趕進城去，到那局

裏報告和表演他的新發明。局裏的職員聽他說明來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傘來，讓他看個仔細。

這正是自以為聰明的思而不學者的活畫像了。既有幸又不幸的是，我們常常看見這樣頭頂破布卻顧盼自雄的所謂思者，曾經、正在並將繼續一個接一個地粉墨登場、招搖過市。

五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仲由也就是子路率性魯莽又好面子，孔子因而教訓他說：求知之道，就在於知道的就說知道，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強不知以為知，不是自欺就是欺人。朱自清在《不知道》一文中發揮說：

知道自己的不知道，並且讓人家知道自己的不知道，這是誠實，是勇敢。孔子說「是知也」，這個不知道其實是真知道——至少真知道自己，所謂自知之明。

這兩句話在歷代不斷為人引用，上起西漢韓嬰闡發經義的《韓詩外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內不自欺，外不誣人。」下到清人李漁的《閒情偶寄·器玩部》：「『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此聖賢無欺之學，不敢以細事而忽之也。」而今已經成為人人可以脫口而出的格言。但要真正做到，一則需要有承認自己無知的勇氣，二則需要知道自己無知的明智，而這談何容易——不承認自己無知而強詞奪理、不知道自己無知而自以為是的活例在網

上、在報上、在電視上乃至在學術著作中隨處可見。半個多世紀前朱自清曾慨嘆「世間有的是以不知為知的人」，而今這樣的人是在遞減還是在激增？

只能回答「不知道」了！

聽過一個英語的繞口令：

If you understand,
Say “understand”.
If you don’t understand,
Say “don’t understand”.
But if you understand and say “don’t understand”,
How do I understand that you understand?
Understand?

中譯：

要是你知道，
就說「知道」。
要是你不知道，
就說「不知道」。
可要是你知道了卻說「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你知道？
你可知道？

如果把後半部分改為「可要是你不知道卻說『知道』，我怎麼知道你不知道」，就幾乎可作為孔子這段本來也不無繞口令意味的名言的譯文兼注文了。

六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孔子對鬼神的實際存在是懷疑的，但殷周以來迷信鬼神的傳統觀念既迷漫於當時，所以孔子採取敬而遠之、存而不論的態度——「子不語怪力亂神」。近代思想家嚴復認定「孔教之高處，在於不設鬼神，不談格致，專明人事，平實易行」。魯迅更揭示說：「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聰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使兩個『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時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裏的反對來。」

印順法師在《成佛之道》中稱，鬼神觀念在東西方都存在，形態各異，名目繁多：

這些鬼神，確有一些功德，有一些神力……在某種情形下，確能給人以多少助力，所以常為人所崇拜：懇求賜福，求他驅逐邪惡，或者請求不要傷害。然鬼神都充滿煩惱，他們的德性，有時還不及人類，特別是瞋恚成性，嗜好兇殺傷害。他們所要人類供給的，是犧牲——血肉，甚至要求以人為犧牲。如人而不恭敬供養，或者冒犯了他，就會用殘酷的殺害來報復——狂風、大雨、冰雹、瘟疫等。這等於人間的黑社會、惡

勢力：在你不幸時，也許會拔刀相助，慷慨解囊；可是你不能得罪他，或者使你就此落入罪惡淵藪……俗語說「引狼入室」、「引鬼入門」，鬼神的崇拜者，每每為了得罪鬼神，弄得家敗人亡，這真是何苦呢！孔子到底是人類的偉人，他的「敬鬼神而遠之」，不失為聰明的辦法。

孔子對鬼神的態度，在兩千多年後還能使一代宗教泰斗如此心悅誠服——就憑這一點，孔子也無愧「到底是人類的偉人」了。

七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孔子表彰過伯夷、叔齊的「不念舊惡」，但這並不等於提倡不設底線地泯滅是非。「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如果人人都「以德報怨」，那麼我們用什麼來報德呢？所以孔子明確要求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直」也就是正直、公正。《史記·魏公子列傳》曾記信陵君門客之言：「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清代學者錢泳讚賞「其言最妙，然總不如『以德報怨，以德報德』二語之正大光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很久了，代表正義的力量仍在不懈地搜捕那些當時逃脫了審判，後來隱姓埋名、東躲西藏在世界各地的納粹戰犯。是不是到了一笑泯恩仇、寬恕這些垂垂老矣的殺人兇手